

增长非连续的原因与创新路径的转换

袁富华¹ 张 平¹ 李兆辰²

(1.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 北京 西城 100836; 2.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 北京 房山, 102488)

[摘要] 从赫希曼诱致机制以及纯粹技术联系的角度来看,经济过程自身无法解决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处于发展阶段转换的中国经济,主要遇到两个挑战:一是工业化步入成熟之后,原有诱致机制开始削弱甚至失灵,这将导致效率改进的工业化基础逐步丧失;二是启动结构服务化与知识过程之间的良性循环,以建立城市化阶段的创新环境。鉴于中国经济正在发生“以产品生产为中心”向“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转变,经济社会协同成为内在要求。

[关键词] 诱致机制; 发展; 消费; 增长非连续; 结构服务化

[中图分类号] F12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801(2018)01-0112-10

DOI:10.14119/j.cnki.zgxb.2018.01.015

引言

从赫希曼诱致机制以及纯粹技术联系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判断是:经济过程自身无法解决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问題。当把产业雁阵模型拓展到结构服务化阶段,上述判断成立的理由是:推动工业化起飞直至工业化成熟这个较长时期的产业联系效应,在城市化和结构服务化阶段要么弱化了,要么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失灵了。产业联系弱化甚至失灵的原因,在于服务业对工业的替代及相应服务业主导经济过程的发生,同时也在于消费对投资的替代及相应消费主导经济过程的发生。

工业化向城市化转型的这种趋势,意味着经济过程由工业化阶段“以产品提供”为中心向“以

人的发展为中心”的转换,即,结构服务化是围绕知识和人力资本这些关键要素建立起来的。因此,现代城市化是根本不同于工业化的另一种生产函数。

现代城市围绕要素培育进行运作,由此导致的服务业要素化趋势,对于转型经济的理论和现实,具有极其重要的分析意义:第一,要素服务化趋势促使规模经济消失,知识经济的建立和人力资本的使用,更加倾向于范围经济。第二,要素化趋势下,科教文卫等与广义人力资本积累有关的因素,日益成为不能直接进入投入产出矩阵表的分离的因素,日益成为类似于社会先行资本的发展的前定条件,而不是作为工业部门延伸或发展结果的一种存在。第三,结构服务化过程的维持,使得

[收稿日期] 2017-11-1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需求结构转换背景下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研究”(15ZDC01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减速、转型风险与国家生产系统效率提升路径研究”(14AJL006)。

[作者简介] 袁富华(1968-),男,山东成武人,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 平(1964-),男,广东梅县人,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兆辰(1993-),北京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

广义人力资本的积累更加制度化,这是消费结构升级得以实现的前提,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社会与经济之间的协同,本质上构成经济可持续的内在要求。

一、理论综合的提示和雁阵理论框架

二战后经济理论对欠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关注,一度推动了经济实践。但是,鉴于发展理论中归纳方法和历史资料的局限,面对工业化向城市化转型乃至结构服务化主导发展(状态)的一系列全新事件,有必要进行观念的更新。对传统发展理论的再审视与理论升级,有助于理解中国这类后工业化经济体所面临的问题和未来转型方向。

作为我们前期研究的进一步整合,本文依托雁阵模型这个具有实质意义的分析框架,通过纳入罗斯托增长阶段的思想 and 赫希曼的诱致机制,分析结构条件变化或不同阶段发展状态变化所导致的后果。预先给出的一个提示性结论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向结构服务化转型的失败,源于投资诱致机制弱化或失灵。换句话说,发展阶段转型和城市化时期的经济停滞,以及相对于理想的线性雁阵升级路径的偏离,源于结构服务化过程中“后向关联”能力的低下,当然也与“前向关联”所蕴含的经济意义的变化有关。

工业化向城市化转型过程所据以运转的条件和结果,可以归纳以下三个基本命题。(1)有效率的产业结构服务化,或者服务业/消费主导的现代城市化——即二战后发达国家所昭示的现代服务业主导经济,产业关联越来越表现出“要素化”的趋势^[1]。与工业化阶段的产业发展比较起来,这种要素化趋势的特别之处,在于产业发展的前向联系作用突出——产品或要素作为其他部门的投入:或者表现为中间品投入,或者表现为高层次人力资本和知识。这种现象同时也成为新的创新途径生成的主要原因。(2)以知识生产配置为特征的要素化趋势,使得部门产品生产的界限模糊,要素的专用性和特定性,促进工业化的规模经济向结构服务化的范围经济转变。在专用和特定的范围内,服务业与制造业关联度增强。(3)

产业关联的隐蔽性增强,溢出效应和外部性增加。根据发达国家经验,这与服务业偏向于知识过程这种结构特征有关。知识过程一般不具有工业化阶段产品生产函数的简单可加性,某种程度上甚至是不可测度的,典型如教育和研发的溢出效应。

在发展状态变化及其向发达水平的收敛过程中,不同阶段的发展模式存在特征性差异。经济史研究尽管承认城市化与工业化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但是,若从发展阶段转换和产业演进的角度看,把以知识生产配置和福利社会建设为中心的城市化,看成后工业化的一种新高度,仍有合理性和必要性。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我们曾就产业雁阵模型拓展到城市化,给出了一种方案,这种方案主要依据美国经济史学家关于知识密集服务业脱胎于工业化巨大生产力的思想^[2]。

理想的线性雁阵模型。由主导产业成长所推动的工业化起飞直至成熟这条线性路径,在日本独具特色的产业经济学中,得到了系统阐释。这种立足于分解方法的理论模式,不仅给予狭义经济问题分析,提供了具有丰富政策内涵的指导,而且,鉴于分解方法自身蕴含的协同性质,这种理论同时有助于对复杂发展事件相互作用——市场制度和非市场制度相应作用——的后果进行分析,有关探索主要体现在一些学者的研究中^[3]。

根据 Ozawa (2000, 2003)^{[4][5]},从劳动力禀赋到资本要素使用直至知识生产配置的整个经验性工业雁阵升级模型,阶段划分如下:以纺织为主导的劳动要素驱动阶段;以钢铁、化工为主导的非差异化产品阶段;以汽车为主导的差异化产品阶段;以计算机为主导的知识创新阶段;基于互联网的信息化阶段。在我们的理解中,理想的线性产业雁阵演进,不仅表现为上述主导部门更替和效率持续改进,而且表现在服务业替代制造业过程中,结构服务化主导(及相应消费需求主导)趋势的形成^[2]。并且,鉴于现代城市化本身具有的新的特征,特别是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知识生产配置机制的建立完善,赋予了结构服务化和消费结构升级更加丰富的内涵。虑及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阶段普遍遇到的问题,雁阵模型的这

种拓展尤其具有重要性。

服务业要素化趋势:为什么要定义这种现象?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理想线性雁阵路径的达成,单纯从经济角度来看是工业和服务业的协同问题。实质上,它蕴含了城市化时期结构条件变化下,如何实现整体经济协调发展这样的要求。为此,我们需要引入服务业要素化趋势,以便突出问题的关键。

首先来看在协同条件下,线性的产业雁阵升级的方式。就像我们强调的那样,从长期经济过程看,脱胎于工业部门并且充分发展了的现代城市化,在服务业持续替代工业份额并成为主导部门的同时,服务业也以其效率溢出和效率补偿作用,维持着后工业化时期的经济可持续性。换句话说,工业化向服务化的转型以及结构服务化过程,是遵循效率补偿原则进行的,这样的原则是城市化不同于工业化的重要差别之一。差别之二,在于雁阵模型拓展到服务业之后,消费与投资之间的权衡方式,体现为公平原则。类似于部门新陈代谢的动态平衡,在理想雁阵模型中,物质资本积累与人力资本之间也存在一种动态权衡,这种权衡是服务业效率补偿的必要条件:一方面是消费比重的上升,更为重要的是消费需求向科教文卫的结构升级。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经验结论:如果说工业化是围绕产品(特别是物质品)生产展开的话,那么,现代城市化和服务业的发展,则是围绕人的发展和知识过程建立——具体体现为广义的人力资本积累,城市化是围绕要素中心展开的、不同于工业化的新型生产函数。具体地:以物质品生产供给为核心的工业化,是尽可能利用自然资源、劳动力等已经存在的有待开发的潜力(典型如,资源禀赋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或发展状态而言,这种潜力的开发至少要坚持到非差异化工业品生产阶段。随着差异化生产阶段的到来,产品质量提高需要更多的知识要素加入,迫使经济不得不转向智力培育——于是开启以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为特征的服务业要素化趋势,即关注人的发展和创新潜力的培养。显然,要素的培育成为前提条件。由于要素化这种新的发展趋

势,把人的能动性放在关注的中心,因此不同于工业化理论中把人作为“劳动力”投入的被动适应性。人的发展成为城市化这种新模型中各因素权衡与协同的关键。

发展的普遍现实及其与理想模型的偏离。拉美结构主义理论批判现代化理论关于市场法则普遍性和线性演进的假设,强调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性与发展模式的差异性。这与后发国家普遍存在的社会结构和制度组织障碍,对效率线性改进路径带来的扭曲后果有关。但是,不能据此说理想的线性演进模型错了,毕竟它是作为发达国家的经验而客观存在的。根据 Ranis(1981)^[6]对工业化经验的考察,后发工业化国家普遍呈现的产业雁阵升级受阻及相应理想模型的偏离,一般发生在消费品制造的“简单阶段”、向中间品制造的“复杂阶段”的转型时期。其间,差异化产品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尤其难以确立,因为从这个阶段开始,对内生的创新和知识过程的要求渐趋显著。

我们的意见是,根据工业化的普遍经验,在经历了劳动密集型纺织业推动和非差异化的重化工业推动之后,后发国家工业化过程进入成熟时期。也正是有了这两个阶段的准备,发展中国家现代城市化的步伐加快:表现为人口的区域集聚、城市消费示范效应增强以及社会福利建设呼声提高。换句话说,工业化的成熟,开启了一个不同的城市化阶段,同时,也开启了中等收入水平迈向发达阶段的大门。但是,鉴于城市化是建立在服务业和消费之上的新的模型,如果人的发展这个关键环节处理不好,效率补偿机制不能发挥作用,将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这样的长期问题。

二、罗斯托、赫希曼和雁阵理论综合

注重经济社会协同的波兰尼主义,是理解战后发展理论的一把钥匙。特别是1960—1970年代那场关于实质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争论,在某种程度上为发展理论的独特性奠定了基础^{[7][8]}。遗憾的是,后发国家理论研究中,由于对经济历史和思想史的

忽视,传统发展理论曾经的影响以及再反思的热情淡化了。老派发展理论学者——如罗斯托和赫希曼等,在其思想中都严格体现了经济作为供求组织的制度化进程这种实质主义假设。他们把经济发展视为潜力不断开发和资源不断整合的上升过程,并且由此生发出了不同的模式和阶段性特征。限于研究目的,这里,我们主要就产业雁阵模型的运作机制,给出进一步的说明,据此归纳出结构服务化不同于工业化的模式特征及其结果。

(一)罗斯托、赫希曼与雁阵模型

上文关于产业雁阵序贯的演进^{[3][4]}——从汽车主导的差异化产品阶段直至信息化主导阶段,与罗斯托经济增长阶段中的“大众高消费阶段”(及其后),存在着交叠和汇合^[9]。从发展事实和理论含义上讲,这个汇合点蕴含着工业化向现代城市化的转型、中等收入水平向发达阶段的迈进,当然也包括罗斯托所谓成熟阶段向大众高消费阶段的转型风险。无论是理想的线性雁阵序贯的最终达成,还是工业化进入困难阶段之后效率改进的失败,都与赫希曼“诱致机制”的运行状态密切相关^[10]。

罗斯托的增长、协同及其对结构服务化过程的理论启示。毫无疑问,就针对发展条件变化采取协同措施以保证持续增长而言,罗斯托是典型的实质主义者。其五阶段理论——即传统社会、起飞准备、起飞、走向成熟、大众高消费(及其后),实际上勾勒出了与 Ozawa 本质上相同的阶段序贯模型(而非一个不发生跳跃的连续统)。并且,他的实质主义的协同思想,又与我们把雁阵模型拓展至服务业的一些认识一致。总的来说,罗斯托思想在应用于城市化发展和结构服务化的一些有益启示如下:

首先,(工业技术)成熟阶段完成——或者,农业部门劳动力比重降低到20%以下——和大众高消费阶段的开启,意味着现代城市化过程加速直至迈向城市化成熟。这种认识暗含了结构服务化主导过程的发生,本质上不同于工业化。差别在于,工业化成熟阶段是一个充满危险的时期,需要面临着妥协性选择,工业化过程中压倒一切的生产供给目标开始发生转变。对此,罗斯托的精辟结论是:当工业化成

熟这一阶段完成后,人们开始认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发达社会,其心理日益表现出成熟经济的目的——如1950年代之后发达国家差异化消费偏好的发展以及发达国家之间消费的收敛;随着经济社会进入大众高消费阶段,市场目标与社会目标的平衡问题日益重要,包括社会安全、再分配、休闲等积极的人性化目标和政策的实施,用以软化市场功利主义的冷酷,实现产出最大化向福利国家的转变。因此,从理想的线性雁阵序贯角度看,结构服务化过程的重心,自然就是罗斯托所谓从生产供给主导转向消费需求主导,亦即从生产问题转向消费和广泛的福利问题。

其次,步入成熟阶段之后,社会经济协同中的个体行为也存在再平衡的需要。个体应被视为“复合个体”,不只是局限于最大化行为,而是更广泛的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的目的和行为,包括对权力、休闲、安全、经验、价值观念的追求。换句话说,经济结构变化及其与文化社会“超结构”的协同,是结构服务化过程中的重要问题,它直接涉及人的发展这个中心目标。

再次,消费超越了基本的衣食住行而进入耐用品和服务业品——就现代城市化而言,这不仅意味着更高级的服务业结构的产生,而且意味着成熟社会新观念的形成。这一切都建立在新的中产阶级的培育和形成基础上。专业、技能型工人的增加,构成现代知识过程和创新精神的源泉。知识技能的积累改变了主导部门发展和经济联系的特征,正如罗斯托明确指出的那样,如果说工业化起飞直到技术成熟这个时期,经济增长和经济联系主要从供给面的成本降低中获得动力,那么,大众消费时代,经济发展更加依赖于消费需求主导。经济动力的这种结构变化,对于后续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为了对此有一个充分理解,我们联系赫希曼的观点进行说明。

赫希曼的诱致机制及其作用。罗斯托增长阶段中主导部门的兴衰交替,源于技术和企业家精神复合体所导致的报酬递增事件的发生和报酬递减现象的出现^[11]。对此,赫希曼也表示同意^[12]。在他的视

野中,由产业联系所带来的累积性增长效应和自我维持的发展,得益于投资诱致机制的拉动和广泛存在的外部经济。

这种外部经济直接产生于投资之间的相互联系或传染。每一步的新投资诱发后续一系列投资并创造了一个非均衡,一个非均衡导致类似的非均衡,由此建立起增长链条。赫希曼的非均衡与新部门的产生所带来的推动有关,发展政策就是维持和延长这一非均衡的诱致效应:不仅使得产业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发生,而且促使整个经济上下游产业的投入产出联系生成。

有两种诱致机制作用于实质性的经济过程:第一,后向联系或后向关联,或者经济活动的任一非初级活动,诱致该部门投入供给的发生,即,衍生于该部门需求的投入提供。第二,前向联系或前向关联,即那些非最终消费品的生产部门,它们的产出用作其他经济活动的投入。尽管发展政策的制定,要同时考虑这两种诱致机制的作用,赫希曼认为,后向联系在工业化过程中更加重要,前向联系不能作为独立机制而只能起到加强后向联系的作用。

(二)结构服务化为什么是特殊的生产函数?

现在我们可以从理论上对这个问题给出进一步分析了。从纯粹的技术方面来看,城市化及其相应服务业/消费主导,使得工业化时期促进资本形成和高增长的诱致机制削弱甚至失灵了。尤其是在理想线性雁阵的高端——即科教文卫的诱致作用,不仅不能从投入产出表中合理地反映出来,甚至越来越成为其他经济部门效率维持的前提条件。换句话

说,赫希曼诱致机制,尽管在结构服务化过程中依然存在,但比重相对较小的工业部门,(当然还有直接与生产互补的一些服务部门),物质资本积累依然顽强进行着;但是,消费及其与科教文卫相关的广义人力资本积累,却引领了资本积累的方向、并改变了资本积累的方式。

为了对上述分析提供资料佐证,这里暂时以表1的工业化事实作为引子。该表是赫希曼根据Chenery&Watanabe(1958)^[12]数据,所展示出的发达国家曾经的工业化规模扩张的剪影。立足于发达国家理想产业雁阵进行回溯,一些有意义的过程和机制如下:(1)从大的经济阶段划分来看,总体上,工业化过程中的诱致程度大于结构服务化阶段的诱致程度。特别是服务业——除了个别新兴行业外(下文将说明),无论是后向联系还是前向联系,一般都低于工业行业。(2)工业部门诱致程度发生的结构条件,集中于经济/自然的循环作用当中,特别是表1中A、B、C三项。根据工业化雁阵模式和发达国家长期经验,B类中劳动密集型产业(典型如纺织服装业)以其较高的后向联系程度,为资本积累和工业化起飞创造资本条件,直至进入到资本和技术驱动的A类以及B类的机械设备制造,即从容易阶段进入困难阶段,这个阶段也是大规模工业化快速推进直到技术成熟的发展时期。(3)C、D两类由于后向联系较低,一般从属于后向联系较高的A、B的发展。因此如果缺少了A、B的发展,C、D类型的产业不能提供自我维持的发展动力和机制。

我们接着分析现实当中的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表1 部门间的依赖程度

诱致程度	产品
A. 前向联系高、后向联系高 (中间投入品制造)	钢铁; 有色金属; 纸制品; 石油制品; 煤制品; 化学制品; 橡胶制品; 出版印刷制品。
B. 后向联系高、前向联系低 (最终使用品制造)	皮革; 木材; 服装; 交通设备; 机械; 非金属矿物制品; 食品; 船舶; 杂项制品。
C. 前向联系高、后向联系低 (作为中间投入的初级品生产)	进入采掘; 石油天然气; 煤采掘; 农林; 电力; 非金属采掘。
D. 前向联系低、后向联系低 (作为最终使用的初级品生产)	渔业; 运输; 服务; 贸易。

资料来源:Hirschman(1978),第6章^[10]。

状况,针对上文提到过的两种趋势:一是随着雁阵模式的演进,工业部门内部结构随着行业兴衰,导致诱致机制和诱致程度发生或多或少的变化;二是随着结构服务化主导经济的形成,工业化起飞直至成熟这个阶段的“以产品生产”为中心的生产方式,变化为现代城市化下的“以要素生产”为中心的生产方式——即服务业的要素化趋势,这种现象不仅从程度上改变了整体经济的关联,而且从质上重塑了诱致机制。简要的数据分析如表2和表3:

1.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一些中间品制造——如金属、石油制品、橡胶制品等,前后向联系(A类)与过去比较起来依然很高。这些重化工业部门演进到大众高消费时代,主要与居民消费结构中汽车等耐用用品的需求上升有关。一些原来诱致

程度大的部门——如化学制品、造纸,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受结构服务化和环保影响)其影响却降低了,但是在中国这样的正在步入工业化成熟时期的国家,它的增长联系效应依然强大。

2. 大多数后向联系高、前向联系低的产品(B类)——如食品制造、纺织服装、车辆制造等,与过去相比这种产业关联特征没有本质上的变化。(但是,机械和设备制造在发达国家如美国,其前向联系也比较高,反映了技术工艺的高级化)。C类作为中间投入的初级品,其关联性质变化不大。

3. 当今的工业化城市化时代,服务业演化出来了不同于以往的鲜明特征。如表3:第一,总体上来看,服务业部门的诱致程度明显低于工业部门的诱致程度,这与表1所揭示的半个多世纪以前的状况

表2 工业部门间的依赖程度

	美国				巴西				中国			
	1995		2010		1995		2010		1995		2010	
联系	后向	前向	后向	前向	后向	前向	后向	前向	后向	前向	后向	前向
C10T14: 采掘业	0.34	1.18	0.29	1.25	0.55	0.95	0.47	0.71	0.44	0.92	0.41	1.11
C15T16: 食品饮料烟草	0.59	0.22	0.59	0.19	0.57	0.18	0.59	0.24	0.56	0.27	0.58	0.33
C17T19: 纺织服装	0.47	0.21	0.48	0.38	0.3	0.1	0.35	0.12	0.37	0.15	0.4	0.21
C21T22: 造纸印刷	0.39	0.49	0.42	0.45	0.39	0.62	0.47	0.61	0.36	0.56	0.53	0.78
C23: 石油产品	0.77	0.63	0.77	0.56	0.65	0.61	0.74	0.75	0.77	0.94	0.75	0.94
C24: 化学制品	0.4	0.47	0.39	0.37	0.46	0.46	0.62	0.47	0.43	0.68	0.54	0.73
C25: 橡胶塑料制品	0.58	0.81	0.58	0.84	0.54	0.81	0.64	0.93	0.56	0.7	0.55	0.66
C28: 金属制品	0.45	0.84	0.5	0.83	0.49	0.69	0.5	0.67	0.76	0.82	0.8	0.84
C29: 机械和设备	0.46	0.6	0.47	0.68	0.64	0.58	0.63	0.33	0.55	0.4	0.57	0.38
C30T33X: 计算机 电子光学设备	0.33	0.42	0.21	0.67	0.42	0.14	0.53	0.25	0.44	0.23	0.46	0.19
C31: 电器机械	0.5	0.62	0.55	0.71	0.5	0.43	0.62	0.61	0.65	0.54	0.69	0.52
C34: 机动车辆	0.49	0.23	0.56	0.24	0.74	0.02	0.71	0.02	0.5	0.35	0.47	0.25
C45: 建筑	0.53	0.15	0.48	0.24	0.44	0.1	0.44	0.22	0.71	0.04	0.73	0.03

数据来源:OECD.Stat:Dataset: Input-Output Tables。

类似。第二,由于城市化的发展,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传统服务业部门如运输仓储邮电通信等,后向联系程度加强了,这与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便利的发展有关。第三,一些新兴部门,如R&D表现出了很强的前向联系。

总之,赫希曼眼中那种以后向联系为核心所构造的工业化模型,由于结构服务化的发展失灵了。由服务业主导的经济进入一个要么被不确定性——需要通过创新吸收的——前向关联时期,要么就是被诱致程度很低的经济网络控制。也就是说,通过诱致机制建立规模经济的基础基本消失了,经济发展的结构条件发生了变化,由以往经济/自然相互作用,转换为经济/社会相互作用。那么,应当如何解释这种现象,以及对未来发展的挑战做出什么样的

预期呢?

(三)服务业要素化趋势特征和机制的进一步解释

1.作为发展前提条件的知识生产配置要素。除了那些直接与产品生产相联系的交通运输、批发零售、金融、R&D等所谓生产性服务业,把诸如公共管理、个人服务、社会保障、教育等纳入投入产出表有些勉强,甚至单纯从投入产出技术角度来说,这种分解方法什么也说明不了。既然我们认为雁阵模型的高端——结构服务化是不同于工业化的另一种生产函数,那么这些与广义人力资本积累有关的机制,就应当用其他方式解释。当然,最直截了当的做法是把这些行业从投入产出表分离出来,单独给出说明。

以教育这种典型的经济和社会现象为例,它一

表3 服务部门间的依赖程度

	美国				巴西				中国			
	1995		2010		1995		2010		1995		2010	
联系	后向	前向	后向	前向	后向	前向	后向	前向	后向	前向	后向	前向
C50T52: 批发零售	0.32	0.51	0.31	0.48	0.09	0.54	0.26	0.47	0.41	0.62	0.34	0.73
C55: 住宿餐饮	0.5	0.19	0.46	0.18	0.45	0.12	0.57	0.13	0.6	0.45	0.58	0.68
C60T63: 运输仓储	0.39	0.52	0.36	0.52	0.37	0.5	0.45	0.63	0.34	0.81	0.45	0.87
C64: 邮电通信	0.2	0.41	0.31	0.33	0.56	0.55	0.42	0.68	0.4	0.81	0.36	0.58
C65T67: 金融媒介	0.19	0.3	0.17	0.26	0.22	0.65	0.24	0.46	0.25	0.78	0.27	0.81
C70: 房地产	0.23	0.23	0.24	0.23	0.1	0.13	0.08	0.28	0.15	0.34	0.37	0.26
C72: 计算机相关活动	0.29	0.59	0.34	0.74	0.36	0.61	0.39	0.89	0.63	0.74	0.73	0.72
C73T74: R&D 和其他 商业活动	0.25	0.62	0.22	0.65	0.37	0.88	0.35	0.9	0.35	0.56	0.63	0.73
C75: 公共管理和社会义务	0.4	0.07	0.46	0.06	0.36	0.16	0.37	0.18	0.5	0	0.48	0.02
C80: 教育	0.23	0.1	0.25	0.09	0.28	0.06	0.25	0.08	0.45	0.07	0.38	0.14
C85: 健康保障	0.35	0.01	0.37	0.01	0.45	0	0.41	0.01	0.55	0.03	0.57	0.15
C90T93: 其他社会和个人服务	0.35	0.27	0.35	0.26	0.51	0.15	0.48	0.13	0.55	0.29	0.49	0.53

数据来源:OECD.Stat.Dataset: Input-Output Tables。

度作为工业化的基础条件存在。更为重要的是,在工业化成熟直至进入大众高消费阶段(及其后)的一个相当长时期,随着产品质量提高和经济效率维持的需要,教育发展日益制度化为发展的决定性条件,越来越具有社会先行资本的性质。围绕教育所建立起来的知识生产配置过程及其循环,是针对人力资本和知识要素的创造、积累进行的,这种经济循环的作用,这种体现在知识过程的溢出效应,而非直接的产品生产供给上。就教育普遍具有的公共产品特征这一层面而言,更加带有制度性色彩,连同社会服务、社会保障等公共品,共同构成现代城市化发展自我维持的制度前提。

2.需求收入弹性的作用。回顾前文罗斯托关于大众高消费时代消费需求的收入弹性、接替工业化阶段供给-成本主导增长的论断。这个假设建立在他的五阶段线性增长理论之上,联系结构服务化过程中诱致程度的弱化和诱致机制的“失灵”,似乎可以这样认为,消费需求自身蕴含着“诱致效应”的补偿,这与我们关于城市化阶段服务业和消费必须提供效率补偿的认识^[13],本质上是一致的。

既然成本降低的前后向关联在服务业/消费主导的发展条件下不是重要的,那么城市化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高成本的。实际上,大众高消费——这个建立在发达经济阶段的假设,与高成本并不矛盾。逻辑上,高收入为高消费产品提供了机会。以发达国家的结构服务化为例,一方面,服务业自身朝向知识密集型的升级,促进了人力资本积累和技能提高,成为高效率的条件,另一方面,知识过程的溢出效应,进一步加强了制造业的竞争能力,最终促使整体经济效率、消费能力和服务业知识化的良性循环。

这个良性循环中,消费结构升级以一种迂回的方式,隐蔽性地发挥着类似于工业化过程中的诱致效应。迂回的方式,当然是通过建立消费结构升级与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实现经济联系的协同。

3.结构服务化下产业关联的隐蔽性和范围经济。也正是这种替代了直接的产品生产的——服务业要素化趋势和迂回特征,赋予了结构服务化

过程更加密集的网络化特征:工业化阶段的规模经济消失了,继之而起的是由特定知识和特定人力资本要素构建起来的范围经济。这种范围经济的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罗斯托所谓高消费时代即其后的“差异化口味”,对应了Ozawa雁阵模型中生产供给的差异化产品,同时对应了赫希曼非均衡经济机会的创造和外部性。

三、服务业 / 消费主导、发展路径分化与创新模式变化

(一)知识过程建立的方式与创新模型的变化

当然,从技术进步和效率改进的角度看,至少从经济起飞开始,持续的知识过程就已经逐步建立了。所不同的,只是二战前知识积累速度相对较慢。因此,诱致机制虽然技术上表现为主导部门的兴衰变迁,实质是知识过程的新陈代谢。而当代知识信息经济的崛起,甚至改变了知识过程的形成路径。

大规模工业化起飞直至技术成熟,这个供给—成本决定的阶段,一直为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和开发所主导,学习路径是通过“干中学”效应。这个效应包括两个环节:经验的累积,以及设备投资的增加(或资本深化)。在贸易和市场的扩大的条件下,这两个环节构成一个上升的循环。从第一次产业革命发生直至工业化成熟,这个循环一直是诱致机制得以运转的核心支撑。从当代经济追赶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验来看,这个过程尤其真实。

但是,正如罗斯托所揭示的那样,在工业化成熟阶段和大众高消费阶段的转型时期,如果主导部门带动力削弱了(换句话说,产业发展的诱致程度降低了),那么在充分就业的条件下,以往的供给—成本导向的生产模型,将难以保证效率的持续改进,除非消费发生外移。

我们认为,罗斯托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把现代城市化阶段消费需求主导的重要作用揭示出来,正是有了这种思想的支撑,消费结构升级这个被主流理论长期忽视的经济观念,才得以深入理解,并由此进入学习路径转换和知识积累方式建

立的消费者领域。

与罗斯托消费主导的思想本质上相互一致,一些研究——如Korkotsides(2007)^[14]认为消费需求应当被理解为结构而非规模,消费行为是基于(不断更新的)知识而非(现存的)信息产生的。在消费资本主义时代,消费者的创新类似于企业家精神,他们用新颖的方式评价商品,并形成对特定商品消费需求的暂时的垄断以吸引模仿者。基于学习和鉴别力的消费者,给生产商品质量改进带来压力,促使新的产品出现和质量改进。因此,消费需求主导的经济形成了“消费能力—知识—生产效率改善”这个特殊的循环。

(二)创新路径的变化与增长非连续风险

问题在于,正如斯托夫斯基(2008)^[15]认识到的那样,消费是一种需要学习的技能。工业起飞至今,欧美发达国家为了缓和工业化严酷性和保证经济发展的持续性,较早对劳动力收入保障进行立法,并逐步形成了高消费的传统以及高消费与高效率的循环。尤其是在二战后,欧美对劳动力教育投入的重视,为当代知识经济的形成奠定了长期的扎实的基础。因此,发达国家的这种从工业化供给导向朝服务业/消费主导的转换是连续的。

对于发展国家而言,增长非连续表现为发展路径对理想的线性雁阵演进路径的偏离^[13]。这种偏离可能比较早地处在工业化过程中,如上文所述,拉美结构主义关于发展中国家由于无法建立技术优势,导致依赖初级品生产的外围分工地位的固化。这种没有经历完整的工业化过程——即没有实现工业化困难阶段跨越和技术成熟的经济,最终将导致“早熟”的城市化。中国属于大规模工业化结束之后面临不确定的另一类经济。实际上,根据正在发生的结构性减速,以及城市化过程中结构条件的新变化,中国经济现阶段正处于非差异性产品生产(即通常所谓规模化、标准化),向差异性产品生产的过渡时期。因此,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工业化成熟之后能否避免非连续、避免陷入长期不确定性调整的问题。

工业化向城市化转型时期增长的非连续,根源在于结构服务化过程中对要素化趋势的忽视。通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对比,这种印象更加鲜明。正如我们经常强调和突出的那样,与发达国家比较起来,拉美国家科教文卫等与广义人力资本形成有关的消费比重,长期受到抑制。尽管这些国家的消费比重和城市化率很高,但是决定人力资本和知识生产的关键环节是缺失的,也就是说,消费者的消费创造性及其蕴含的经济机会,在这些国家中是受到根本抑制的。在工业化诱致机制较弱甚至诱致机制失灵的情况下,这种缺失是致命的。中国由于人口规模这种大国效应的影响,全社会平均的科教文卫消费比重也较低且增长缓慢,整体上来看,除非知识要素培育较好的大城市在消费主导和服务业/消费效率补偿方面快速取得突破,否则也将陷入转型的长期调整困境和风险。

结论

上文分析给予我们的总体印象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过程自身无法解决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处于工业化向城市化转型时期的中国,主要遇到两个挑战,一是工业化步入成熟之后,原有诱致机制开始削弱,这将导致效率改进的工业化基础逐步丧失;二是如何启动消费结构升级—知识过程的良性循环,毕竟它们提供了城市化阶段的创新土壤。服务业要素化趋势,无疑要求中国要重新确立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方向,但是转型风险也将由此诱发。原因在于:原有工业化所赖以快速推进的人口红利,正在变成城市化时期的人口负担,附加于劳动力之上的教育程度普遍压低在中等和低等层次。这种适应于加工制造的知识结构,根本不能与服务业和消费主导的效率补偿要求相适合,并且,大规模的城市化的展开,必将加剧社会成本的扩大。矛盾缓和的可行途径,可能在于重建以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为中心的增长极,以城市的知识生产过程建立的比较优势,带动新一轮中国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袁富华.服务业的要素化趋势分析:知识过程与增长跨越[J].北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6,(6).
- [2]袁富华,张 平.雁阵理论的再评价与拓展:转型时期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的诠释[J].北京:经济学动态,2017,(2).
- [3] Ozawa, T. The New Economic Nationalism and the ‘Japanese Disease’: The Conundrum of Managed Economic Growth[J].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1996, 30(10).
- [4] Ozawa, T. Small- and Medium-Sized MNCs, Industrial Clusters and Globalization: The Japanese Experience[C]. In: Hood N. and Young S. (eds) The Globalization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Activ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M]. London: Macmillan, 2000: 225-248.
- [5] Ozawa, T. Pax Americana-led Macro-clustering and Flying-gesses-style Catch-up in East Asia: Mechanisms of Regionalized Endogenous Growth[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2003, 9(3).
- [6] Ranis, G.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Posed by Asia's Superexporters: Implications for Manufactured Exports from Latin America[C]. In: W. Baer and M. Gillis (eds) Export Diversification and the New Protectionism: The Experience of Latin America[M]. Bureau of Economic and Business Research,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1981: 204-230.
- [7] 加雷斯·戴尔, 卡尔·波兰尼. 市场的限度[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 [8] 卡尔·波兰尼. 巨变: 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 [9] Rostow W. 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 [10] Hirschman A. O. 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M]. W.W. Norton & Company, 1978.
- [11] W.W. 罗斯托. 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 [12] Chenery, H. B. and Watanabe T.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of the Structure of Production[J]. Econometrica, 1958, 26(4).
- [13] 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 增长跨越: 经济结构服务化、知识过程和效率模式重塑[J]. 北京: 经济研究, 2016, (10).
- [14] Korkotsides A. S. Consumer Capitalism[M]. Routledge, 2007
- [15] 提勃尔·西托夫斯基. 无快乐的经济[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责任编辑 德 祥)

Reasons of Discontinuity in Growth and Shift of Innovation Path

YUAN Fuhua ZHANG Ping LI Zhaochen

Abstract: view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rschman Inducing Mechanism and pure technical connections, the economic process itself cannot solve the problem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Chinese economy at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is mainly facing two challenges. First of all, with the mature of industrialization, existing inducing mechanism starts to be weakened or even stops to function, which leads to the loss of industrial basi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efficiency. Secondly, the initiation of the sound circulation of structural service and knowledge process, so as to create an innovative environment for urbanization stage. As Chinese economy is transforming from production centred to people's development oriented,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ordination becomes the innate requirement.

Key Words: The Inducing Mechanism, Development, Consumption, Discontinuity in Growth, Structural Service